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视角下的 地理标志保护

王笑冰 ©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视角下的 地理标志保护

王笑冰 ©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视角下的地理标志保护 / 王笑冰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9. 4

ISBN 978-7-5203-4247-6

I. ①经… II. ①王… III. ①地理-标志-保护-研究-中国
IV. ①D923. 43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9)第 062934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任 明
责任校对 张依婧
责任印制 郝美娜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84083685
门 市 部 010-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装订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9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15
插 页 2
字 数 248 千字
定 价 85.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 010-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成果 (12BFX095)

内容提要

为了克服经济增长带来的生态环境破坏、城乡发展和区域发展不平衡、贫富差距过大等问题，党的十七大提出了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战略任务。该任务目标涉及生态环境保护、促成集约型经济增长和促进社会公平和谐三个方面的内容。地理标志作为一种新型知识产权，具有地域性、集体性和保护地方文化、生态的效应，是实现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之政策目标的有力工具。

本书的基本内容如下：第一章探讨了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战略提出的背景 and 原因，分析了这一战略任务的内涵和目标并以此作为本书研究的现实和政策背景。生态环境危机、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的难以为继和社会不公的加剧是促成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三大原因，其目标就是转向可持续发展，实现生态环境保护、经济集约增长和促进社会的公正和谐。地理标志作为一种主要适用于农产品和食品的知识产权，具有促进农业发展、维持农村社会文化繁荣稳定和保护农村生态环境等效益，是实现农村可持续发展的有力政策工具。法国孔泰奶酪、贝宁的米赛加利和南非路易波士茶等实例为地理标志的农村可持续发展效应提供了实证检验。

地理标志的溢价优势使产品在市场中具有竞争优势并有力促进了出口。本书第二章先以欧盟为例，探讨了消费者对地理标志认知情况，并结合法国、意大利、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地理标志产业介绍了发达国家利用地理标志提升产品市场效益和促进出口的成功经验。锡兰茶和 Basmati 作为发展中国家地理标志的代表，也显现了明显的市场竞争优势，成为斯里兰卡和印度、巴基斯坦的重要出口产品。但由于地理标志法律保护的不足，锡兰茶和 Basmati 的出口市场利益没有得到充分有力的维护。我国地理标志注册的数量增长迅速，相关产业也得到了很大发展。为了促进地理标志产品出口，我国应当选择确定优势出口产业产品并给予必要的支持措施。

第三章对欧盟、美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地理标志保护制度作了介绍分析。欧盟作为旧世界的主要代表,其专门立法为地理标志提供了强有力的客观、绝对保护。美、澳、新等国作为新世界移民国家,主要采用商标保护模式,为地理标志提供相对、主观弱保护。但是,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作为农产品出口大国,为了获得欧盟市场的准入,在地理标志保护问题上作了一定妥协,强化了保护的力度和水平。从国际层面来看,由于多哈回合地理标志议题谈判进展缓慢,欧盟和美国各自通过多边、双边贸易协定来推行各自的地理标志保护立场,新、旧世界角力的主战场从多哈回合谈判转向多边、双边贸易协定领域。

第四章先是对我国现存的三种地理标志保护体系作了介绍和比较,分析了保护实践中存在的权利重叠和冲突问题。然后对我国参与多哈回合地理标志谈判立场的正当性、合理性作了分析论证。我国的谈判立场强调公正、平等原则,要求尊重和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坚持知识产权保护的地域性和主权原则。我国支持将地理标志的客观绝对保护扩大适用于所有产品,但须将之与多边注册、传统知识和基因资源披露议题挂钩,使之得到综合全面解决。这一立场在我国的 FTA 建设中也应一以贯之,以解决当前我国 FTA 之地理标志保护方式不统一、保护强度不一致的问题。

第五章的任务是以关联性要素为核心构建地理标志的独立理论体系。产品与产地的关联性是地理标志的核心要素,其重要性好比独创性之于作品、新颖性之于专利、显著性之于商标,是构建地理标志独立理论体系的基础。但是,不同的地理标志保护制度对关联性有不同的理解,可分为主观关联性和客观关联性。主观关联性构成商标法、不正当竞争法和假冒诉讼保护的基础。客观关联性则构成专门法保护的基础。两种不同的关联性理念不仅导致对地理标志概念的不同理解,而且决定了不同保护制度下的地理标志具有不同的适用范围、确权方式和保护强度。只有把握好关联性要素理论,才能正确认识分析地理标志保护中存在的问题并找到合理的解决方案。

第六章提出了我国地理标志制度设计的构想。从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角度出发,应当采取以专门法保护为主,商标法保护为辅的地理标志保护模式。这两种不同制度的设计应当分别遵循客观关联性和主观关联性的理念。专门法应当采用“原产地名称”之概念,并按照客观关联性理念界定其适用范围,建立以专家审查为核心的确权制度。原产地名称应当

接受职权机关的直接行政监管并享有客观绝对保护。商标法应当按照主观关联性理念进行修正，删除第 16 条之地理标志定义中的“自然因素或者人文因素”，地理标志的适用范围、确权审查程序和规则、法律保护应一体适用商标法之一般规范，不应为地理标志设立特殊规则。就专门法与商标保护的关系而言，应将在先原产地名称注册作为阻碍商标注册的绝对理由；商标注册在先的，应允许原产地名称在不损害在先商标声誉专属性前提下获得专门法保护，使之与在先商标并存。

目 录

第一章 可持续发展与地理标志保护	(1)
一 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可持续发展	(1)
(一) 从经济增长到经济发展——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战略 的提出	(1)
(二) 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内涵和目标——可持续发展	(10)
二 地理标志与农村可持续发展	(23)
(一) 以地理标志促进农业经济增长	(23)
(二) 以地理标志促进农村社会文化的繁荣和稳定	(33)
(三) 地理标志对农村生态环境的保护	(43)
(四) 小结——地理标志支持农村可持续发展的要素分析	(51)
三 案例研究	(53)
(一) 法国孔泰奶酪	(53)
(二) 贝宁米赛加利	(59)
(三) 南非路易波士茶	(63)
第二章 地理标志的市场效益和出口效应	(66)
一 欧盟地理标志保护的市场效益	(66)
(一) 欧盟地理标志注册概况	(66)
(二) 消费者对地理标志的认知	(68)
(三) 地理标志的市场效益和出口效应	(70)
二 发展中国家的地理标志产业——锡兰茶和 Basmati	(72)
(一) 锡兰茶	(73)
(二) Basmati	(76)
三 我国地理标志产业的现状和出口发展策略	(79)
(一) 地理标志的数量和产业、地域分布	(80)

(二) 我国地理标志产品的出口发展策略	(84)
第三章 地理标志的保护模式及国际保护的发展	(88)
一 欧盟的地理标志专门保护制度	(88)
(一) 农产品和食品地理标志的保护	(90)
(二) 葡萄酒和烈性酒地理标志保护	(104)
二 美国的地理标志保护制度	(113)
(一) 商标法保护	(114)
(二) 烟酒税贸局对葡萄酒地理标志的规范	(118)
三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对地理标志的保护	(120)
(一) 澳大利亚	(120)
(二) 新西兰	(124)
四 地理标志国际保护的发展	(125)
(一) 欧盟在贸易协定中力推地理标志强保护	(126)
(二) 美国对地理标志强保护的抵制	(130)
第四章 我国地理标志保护的现状和问题	(132)
一 地理标志的国内立法和实践	(132)
(一) 我国的地理标志保护制度	(132)
(二) 三套保护制度的比较	(137)
(三) 地理标志保护的实践及存在的问题	(142)
二 地理标志境外保护的现状及对策	(144)
(一) 我国参与多哈回合地理标志谈判的立场及其改进	(145)
(二) 我国 FTA 对地理标志的保护	(147)
(三) 我国 FTA 地理标志保护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152)
第五章 地理标志理论体系的构建——以关联性要素为核心	(154)
一 两种关联性之观念与政策取向差异	(155)
(一) 两种关联性概念	(155)
(二) 两种关联性下的立法观念分歧	(159)
(三) 两种关联性的成因及其立法政策取向	(164)
二 两种关联性之制度构造差异	(165)
(一) 确权制度：客观事实之核查与主观认知之评判	(166)
(二) 监控保护制度：固化的刚性公权干预与动态的相对私权保护	(170)

三 两种关联性在国际条约和地区、国内立法中的协调 与共存	(176)
(一) 从《巴黎公约》到《里斯本协定》: 两种关联性在 不同条约之间的并存	(177)
(二) 欧盟地理标志制度: 两种关联性在同一制度规范内 的双轨共行	(177)
(三) TRIPS 协定: 对两种关联性的兼收并蓄	(179)
(四) 德、法的实践: 两种关联性在国内法中的并存与配合 ...	(180)
四 结语	(181)
第六章 我国的地理标志制度设计	(182)
一 地理标志制度的设计理念和模式选择	(182)
二 基于客观关联性的专门法设计	(185)
(一) 应采用“原产地名称”之概念	(185)
(二) 申请主体和权利主体应具有代表性	(186)
(三) 合理确定原产地名称的适用范围	(189)
(四) 建立以专家审查为核心的确权制度	(192)
(五) 确立对原产地名称的直接行政监管	(198)
(六) 明确对原产地名称的客观绝对保护	(200)
三 基于主观关联性的商标法之修订	(202)
(一) 修正地理标志之定义	(202)
(二) 权利人应享有政府授权, 与其他商标权人具有平等的 主体资格	(203)
(三) 根据商标的适用范围确定地理标志适用范围	(204)
(四) 按照商标法一般规则进行确权审查	(204)
(五) 地理标志监控应适用集体、证明商标之通用规则	(205)
(六) 按照商标法规则为地理标志提供保护	(208)
(七) 合理协调与专门法的关系	(209)
附录一 原产地名称保护法建议稿	(210)
附录二 商标法及相关规定之修改建议	(214)
参考文献	(216)
后记	(229)

第一章

可持续发展与地理标志保护

一 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可持续发展

(一) 从经济增长到经济发展——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战略的提出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对经济建设的探索经历了一个从经济增长到经济发展的认识过程。起初，经济建设被理解为单纯的经济增长，目标就是追求经济总量的增加。1958年党的八大二次会议提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这个总路线将“多”和“快”放在“好”与“省”前面，强调经济增长的速度和总量扩张，体现了在当时一穷二白、百废待兴的背景下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提供必要的物质基础的紧迫性。这一路线极大促进了我国的经济发展，但也带来了资源消耗过高，效益低下的问题。1995年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提出了从粗放型向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1997年党的十五大提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改变高投入、低产出、高消耗、低效益的状况”。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是为了提高效益，追求经济总量增加的目标没有改变。对经济总量的追求虽然实现了国民经济的高速增长，但也带来了突出的矛盾和问题，如居民收入差异持续扩大、城乡发展不协调、区域发展不平衡、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等。这些问题无法依靠单纯的经济增长来解决，而且对经济的进一步增长构成严重牵制。2007年党的十七大首次提出了“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战略任务。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相比，“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不仅仅是提法的改变，其背后反映了党和政府在经济发展实践中对经济建设认识的深化。

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是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概念。经济增长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总量和人均产出的持续增长，体现的是商品和劳务产

出数量的增加,表现为国民生产总值(GNP)、国内生产总值(GDP)及其人均值的增长。而经济发展不仅包含商品和劳务产出的增加,还包括经济结构的优化、收入分配的合理、资源环境的改善等。^①可见经济增长反映的是经济产出在数量上的增加,而经济发展反映的是经济社会结构的升级和质量的提高,强调由于经济增长引起的收入增长、经济社会结构的改善优化,着眼于人民福利的增长,其内涵更为丰富,超出了单纯的经济范畴。正如熊彼特指出的,“经济发展不是可以从经济方面来加以解释的现象”,“发展的原因,从而它的解释,必须在经济理论所描述的一类事实之外去寻找”^②。

经济发展必须以经济增长作为物质基础,没有经济增长就不可能有经济发展。但是经济增长不一定会带来经济发展。熊彼特认为:“仅仅是经济的增长,如人口和财富的增长所表明的……不能称作是发展过程。因为它没有产生在质上是新的现象,而只有同一种适应过程……我们将把这种增长看作是数据的变化。”^③因此决不能简单地将经济指标的增长当作经济发展。一些发展中国家有增长无发展的状况也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例如中东石油输出国仅仅依赖石油开采来获得巨额财富和经济增长,但无经济发展可言。更有甚者,一些国家的经济增长带来了环境污染、贫困、疾病等问题,与经济发展目的背道而驰,甚至威胁到人类生存,出现了经济增长破坏经济发展的现象。

相对应地,经济增长方式与经济发展方式也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一般认为,经济增长方式是指推动经济增长的各种生产要素投入及其组合的方式,其实质是依赖什么要素,借助什么手段,通过什么途径,怎样实现经济增长。^④经济发展方式则是指围绕经济发展的目标和要求,通过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经济运行质量全面提高等手段,实现经济社会和谐发展的经济发展模式。可见经济发展方式不只是强调经济的增长,同时还包括经济结构调整、技术创新、合理分配制度和创建和谐社会生活等内容,是一个

① 参见黄泰岩《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内涵和实现机制》,《求是》2007年第18期。

② [美]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对于利润、资本、信贷、利息和经济周期的考察》,何畏、易家详等译,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71页。

③ 同上。

④ 参见唐龙《再论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探索》2009年第1期。

综合性的系统工程。

由此可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不仅涉及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还涉及社会关系的和谐、生态环境的保护等社会和生态维度。十七大报告之所以把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作为“关系国民经济全局紧迫而重大的战略任务”和“实现未来经济发展目标的关键”,是因为既有的片面强调经济增长、唯 GDP 论的发展方式造成了日益严重的生态、经济和社会问题,无法依靠单纯的经济增长来解决。

1. 生态环境危机是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直接原因

正如十七大报告所指出的,我国“经济增长的资源环境代价过大”,造成了严重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改革开放 30 多年来我国 GDP 年增长率达 9% 以上,高速的经济发展背后是巨大的环境代价。我国消耗了全球 19.5% 的能源,但 GDP 仅占全球的 8.6%,单位能耗是发达国家的 8—10 倍,污染是发达国家的 30 倍。^① 根据环境保护部发布的数据,我国 2013 年主要污染物化学需氧量排放总量为 2352.7 万吨,氨氮排放总量为 245.7 万吨,二氧化硫排放总量为 2043.9 万吨,氮氧化物排放总量为 2227.3 万吨,远远超过我国环境的承载力。全国十大水系流域的国控断面中,I—III 类、IV—V 类和劣 V 类水质断面分别为 71.7%、19.3% 和 9.0%。湖泊水库中水质轻度、中度和重度污染的国控重点湖泊(水库)比例分别为 26.2%、1.6% 和 11.5%,富营养、中营养和贫营养比例分别为 27.8%、57.4% 和 14.8%。半数以上的地下水水质较差或极差,优良与良好水质比例不足三成。酸雨发生面积占国土面积的 10.6%,出现酸雨的城市比例为 44.4%。在全国 74 个监测城市中,仅海口、舟山和拉萨空气质量达标,比例仅为 4.1%。^②

严重的环境污染对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和生命健康构成了严重威胁。国外学者的研究表明,大量使用煤炭、石油等能源导致的空气污染会使儿童罹患感冒、支气管炎、哮喘等呼吸系统疾病的概率大幅度增加。^③ 国内

① 参见赵华林《全面加强污染防治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历史必然及对策措施》,《环境保护》2012 年第 19 期。

②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部《2013 年中国环境状况公报》,2014 年 5 月。

③ See Robert W. Mead & Victor Brajer, “Protecting China’s Children: Valuing the Health Impacts of Reduced Air Pollution in Chinese Cities”, 10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Economics* 745–768 (2005).

学者的研究表明,我国各地区的环境污染成本占人均实际 GDP 的 8%—10%,经济增长对居民健康的替代效应远大于收入效应,经济增长最终反而降低了社会健康总体水平。^①

有西方学者提出,人均收入与环境质量措施之间存在一种经验关系,即环境质量随着收入的增长不断恶化,在达到一个峰值后又会逐步改善,呈现“倒 U 形”的关系轨迹,^②被称为“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 简称 EKC)。这种关系轨迹表明,环境污染作为经济发展的副作用,贫穷国家在发展初期将其视为可以接受的代价,当生活水平达到一定高度时,环境问题才会受到更多关注,从而采取环境立法和环保措施。这实际上反映了随着收入的增长,人们对生活质量要求的提高。例如美国的人均收入在 20 世纪 60 年代达到 6000 美元时才开始采取措施治理空气和水污染,使环境库兹涅茨曲线转向下行。^③但是,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并不意味着单纯的经济增长就足以使环境得到改善,也不意味着可以无视经济增长带来的环境问题。经济自由化或者其他以促进 GNP 增长为目标的政策自身并不足以解决环境问题,必须对生态环境保护进行自觉的制度设计,使环境资源效益在任何收入水平上均能得到提升,以确保经济活动在生态系统内保持在可持续的规模范围内。^④因此发展中国家不应当重蹈工业化国家“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而应采取积极的政策干预克服市场失灵、政策扭曲和体制约束等经济缺陷,能动地削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峰值,避免在经济增长过程中出现无法挽回的环境损害(如生物多样性的损失)。^⑤

随着我国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人们开始对环境质量有了更高的需

① 参见杨继生、徐娟、吴相俊《经济增长与环境和社会健康成本》,《经济研究》2013 年第 12 期。

② See Kenneth Arrow et al., “Economic Growth, Carrying Capacity, and the Environment”, 268 *Science* 520 (1995).

③ See Peter P. Rogers, Kazi F. Jalal & John A. Boyd, *An Introduction to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London: Earthscan, 2008, p. 24.

④ See Kenneth Arrow et al., “Economic Growth, Carrying Capacity, and the Environment”, 268 *Science* 520, 521 (1995).

⑤ See Mohan Munasinghe, “Is Environmental Degradation an Inevitable Consequence of Economic Growth: Tunneling through the 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 29 *Ecological Economics* 96, 107 (1999).

求。我国学者对二氧化硫排放与人均 GDP 关系的实证研究表明,我国东部地区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在人均 GDP 达到 18963 元(1990 年价格)时开始越过曲线顶点,进入排放总量逐步下降区域;而中西部地区的排放水平处于不断增加的态势,其库兹涅茨曲线呈单调上扬的格局。这表明收入提高与改善环境的关系是存在的,但是我国大多数省份距离污染物排放转折点仍然遥远。如果按照既有路径发展,中国仍然要经历一个严重污染的时期,才会出现环境改善的整体效果。考虑到环境污染无法完全依靠经济增长和市场力量解决,为了避免严重的环境污染可能造成无可挽回的损失,政府对于改变经济发展方式和改善环境质量的要求应当做出积极的政策反应。^①

环境污染带来的福利减损对于每一个人都是平等的,但是谈判力较强的富人更关注生活品质,对环境问题更为关切。在收入差距日益扩大的中国,中高收入群体的收入增长导致对环境质量的要求大大提高,亦迫使政府以更为积极主动的姿态应对环境问题。

2. 转向集约型经济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内在经济要求

我国长期以来主要依靠劳动力和资本投入推动的粗放型经济增长已经难以为继,因此转向集约型增长成为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内在经济要求。经济增长是经济发展的物质基础,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必然会推动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构成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内在经济要素。

马克思将规模扩大的再生产分为两种方式,即扩大生产场所的外延扩大再生产和提高生产资料效率的内涵扩大再生产。^② 苏联经济学家以此为基础提出了两种经济增长方式:一种是仅仅依靠增加自然资源、资本和劳动等生产要素投入的数量来扩大再生产并实现经济增长的方式,即粗放增长或外延增长;另一种是依赖提高资源或生产要素的利用效率来扩大再生产实现经济增长的方式,即集约增长或内涵增长。^③ 西方经济学家则将解释经济增长的因素分为三类:一是劳动投入增加导致的经济增长,二是资

① 参见蔡昉、都阳、王美艳《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节能减排内在动力》,《经济研究》2008 年第 6 期。

② 参见马克思《资本论》(第二卷),人民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192 页。

③ 参见史晋川《论经济发展方式及其转变——理论、历史、现实》,《浙江社会科学》2010 年第 4 期。

本投入增加导致的增长,三是除劳动和资本之外,因技术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提升、制度改进导致的经济增长,即所谓“索洛余值”(Solow Residual)。索洛余值是依靠技术和制度进步实现的,体现了对劳动和资本等要素投入利用率的提升,亦称为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简称TFP)。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大小可以作为划分经济增长方式的基本标准。当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低于劳动和资本投入增加的贡献率时,可视为粗放型增长;当全要素生产率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大于劳动和资本投入增加的贡献率,即经济增长主要是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和制度创新来实现的,可视为集约型增长。^①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经济增长方式理论是相通的。

经济增长是先有粗放才有集约,但是要维持经济的持续增长,必须从粗放转向集约。粗放型增长依赖劳动和资本投入的增加,但是劳动力供给不可能无限增长,而资本投入的边际生产率存在递减现象,因此粗放型增长是不可持续的。

就劳动力供给而言,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会出现大量青壮年劳动力从农业部门向工业部门的转移,这些无限供给的廉价劳动力为经济发展提供了“人口红利”。当劳动力从无限供给变为相对短缺时,人口红利消失,经济发展就会出现拐点,此即所谓“刘易斯拐点”。^②就资本投入而言,由于资本的边际生产率存在自然衰减的现象,单纯依赖要素积累的发展策略难以为继,使一些发展中国家在人均收入达到中等收入水平后长期陷于经济停滞状态,此即所谓“中等收入陷阱”,以拉美、中东国家为典型代表。^③

粗放型经济增长的不可持续性在苏联的经济发展中得到了充分印证。“二战”后苏联经济经历了30年的外延式高速发展,进入20世纪60年代

① See Gene M. Grossman & Elhanan Helpman, *Innovation and Growth in the Global Economy*, Cambridge: The MIT Press, 1991, p. 22 et seq.

② See W. Arthur Lewis, “Economic Development with Unlimited Supplies of Labour”, in A. N. Agarwala & S. P. Singh eds., *The Economics of Underdevelopment*,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8, pp. 400-449.

③ See Indermit Gill & Homi Kharas et al., *An East Asian Renaissance: Ideas for Economic Growth*, Washington DC: The World Bank, 2007, p. 18.

后经济增长速度明显下降,经济效益越来越差。当时有很多苏联经济学家认为,这是粗放型经济的问题,解决问题的根本出路是从外延增长转向内涵增长。于是出现了1962年的“利别尔曼建议”和1965年的“柯西金改革”,力求推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但这些改革措施都被封杀。1971年苏共“二十四大”正式提出“向集约化为主的发展道路过渡”,苏共“二十七大”又确定了“生产的全面集约化”和“整个国民经济转向集约化轨道”。但是上述主张并没有得到实施,直到1991年苏联解体时,其经济仍处于粗放经营,每个卢布生产基金产出的国民收入从1970年的55戈比下降到1990年的28戈比,降低49.1%。^①

与苏联相比,东亚国家由于实现了向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进入了中等收入甚至高收入国家行列,即使经历了1997—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亚洲经济仍能够强劲复苏,保持持续的高速增长。东亚经济增长奇迹主要归功于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即东亚国家通过大投入的研发提升科技水平和开发新产品,同时优化产业结构和生产网络创造了大量的索洛余值,在要素累计没有增加的情况下仍然保持了经济的持续增长。^②

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一直依赖劳动和资本投入的粗放型增长。在整个改革开放期间,我国处于劳动年龄人口比重最高的时期,不仅为经济增长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供给,而且还创造了高储蓄率为资本积累提供支撑,为我国经济增长同时提供了劳动力和资本供给。这种人口红利通过资源配置机制改革得以释放,并通过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过程而作为比较优势得以实现,使资本报酬递减的时间得以延缓。这导致我国经济增长过度依赖生产要素投入。^③近年来随着人口红利的消失,我国的“刘易斯拐点”开始显现。例如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出现的“用工荒”虽然有多种成因,但劳动力资源减少无疑是一个重要因素。劳动力供给的减少使我国经济的增长更加倚重资本投入,全要素生产率并没有得到有效提高。实证研

^① 参见杨圣明《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难点与对策》,《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11年第1期。

^② See Indermit Gill & Homi Kharas et al., *An East Asian Renaissance: Ideas for Economic Growth*, Washington DC: The World Bank, 2007, p. 105 et seq.

^③ 参见蔡昉、都阳、王美艳《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节能减排内在动力》,《经济研究》2008年第6期。